

秦润卿与近代上海钱庄业

孙善根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一代钱业巨子秦润卿是近代宁波帮的杰出代表。面对挑战, 他带领钱业, 顺应时代要求, 借鉴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革除钱业弊端, 走银行化的道路, 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钱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立足传统又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的作为至今仍值得人们回味。

关键词: 秦润卿; 钱庄; 钱业公会

中图分类号: F830.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0)02-0007-06

钱庄与票号一样都是中国本土金融机构。但进入清末特别是民国以后, 票号江河日下, 迅速衰落, 而以上海为代表的钱庄业仍富有生机与活力,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致长期与新式银行业并驾齐驱乃至分庭抗礼。在这一进程中, 被誉为上海钱业领袖的秦润卿功不可没。他长期担任钱业公会会长(主席委员), 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钱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懈努力, 并取得显著地的成效, 使之成为全国钱业的中心与风向标。本文拟就此作些阐述, 不当之处, 敬请斧正。

一

秦润卿(1877-1966)浙东慈城人, 出身贫寒, 从钱庄学徒起步, 凭借自己的勤奋与不懈努力, 终于受到东家——苏州程氏的赏识, 于 1909 年担任福源钱庄经理。又因其对福源钱庄卓有成效的经营, 受到同业的拥戴, 于 1907 年担任刚成立的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会长朱五楼年老体弱, 秦实际主持工作), 并于 1920 年起连任七届钱业公会会长(总董、主席), 前后主持钱业公会近 20 年之久, 以致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

海金融界, 秦润卿几乎等同于钱业公会。秦润卿曾指出: “我国商人有一种特殊之不良习惯, 不独甲处商人与乙处商人不相联络, 甚至同一区域, 甲种事业之商人与乙种事业之商人各为其政, 从不过问。中国商业之落后, 实以此

为一大原因。”^[1]为此, 他高度重视行业组织在团结商人与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同时, 上海钱业历史悠久, 长期以来在工商业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传统习惯与保守势力也相当强大。近代银行业的兴起与工商经济的发展对钱庄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为此, 作为钱业新派人物代表的秦润卿在任职钱业公会会长期间, 殚思竭虑, 积极整顿与革新会务, 为钱业革新与发展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

(一) 注重钱业制度建设, 规范钱业经营行为
长期以来, 钱庄是个相当传统的组织, 其处理业务的手续虽有传统习惯, 却没有形成文字, 更遑论章程之类, 以至钱业界有“以前钱业公共的事情, 只凭老辈(指钱业领袖)一句话就解决, 用不着记录”^{[2] (643)}的说法。直到 1900 年上海钱业才制订出第一份业规, 但也相当粗略, 仅将以前业务上通行的惯例汇订成条文七条。^{[2] (643-644)}

1917 年钱业公会成立时, 钱业公会制订的《同行规则》只是一种同业公约性质的营业规则, 而非公会章程。为此, 1920 年秦润卿就任会长后即主持制订上海钱业历史上第一个组织章程。该章程共分总纲、职员、会议、会员入会、经费、附则等六章十八条, 并于 1923、1933 年加以修订。章程的制订与不断完善对联合钱庄同业、规范营业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钱业业规是钱业业务规则的汇集。没有规

收稿日期: 2010-01-05

作者简介: 孙善根(1962-), 男, 浙江象山人,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研究员。

矩,难以成方圆。作为经验丰富的钱业行家,秦润卿十分重视钱业业规的制订并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加以完善。1917年钱业公会成立时,秦润卿就参与《钱业营业章程》的制订。该章程实际上是一份业规,共39条,分为“钱业公订同行规则”及“钱业营业章程”两部分,把传统的与现行的各种不成文措施都分别订入条文。1920年秦润卿执掌钱业公会后,即主持修订新的《上海钱业营业规则》。条文由39条增至62条。鉴于1912年前后所有亏倒各庄股东往往推诿责任,延不料理债务,损害了整个钱业的信誉,所以特地订立“停业”一章,将停业钱庄股东责任加以明确规定,并订明由公会负责会同处理。此后钱业业规又经1923年、1933年两度修订,不断趋于完善。

这些不断修订与完善的钱业业规不仅对行业规范作了必要规定,还努力贯彻秦润卿钱业革新的思想。如1917年制定的钱业营业章程规定了交往行号须缮立保单的条款。1920年后修订的营业规则不仅引导钱业从事各种存款业务,特别是引入银行业抵押贷款方式,而且还作出越来越明确详细的规定。如1923年营业规则明文规定:抵押贷款不论定期活期,“出抵人交出之抵押品。如到期不赎,得变卖备抵”。“活期或定期抵押贷款及抵押往来透支,出抵人设有不测情事,不论到期与否,受抵庄家得登报限期取赎,逾期不赎,随时变卖”。^[21](691-696)]这些规定对提高钱庄抗御经营风险能力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公会章程与钱业业规的制订和推行有利于规范钱庄经营,矫正钱庄间不正当竞争,增强钱庄界的协调与合作,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行业自律的作用,有利于整个行业经营的良性发展。

除修订组织章程与业规外,秦润卿还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规范经营与钱庄日常行为、协调联络同业方面的作用。早在1921年农历正月初二,他即召集北市钱业大小同行开会,议决“对于钱业内部整理之计划及对外办法之改善”。^[3]

为提升钱业在社会上的形象,改善公会办公条件,1922年,在秦润卿主持下,钱业公会议决建造四层新屋一所。次年新屋建成,钱业公会迁入办公。以下层为钱业市场,二层为会议室,三、四层为办公室及图书阅览室。正屋后建有公

共保管库,每庄均可领保险箱一具,自行储藏贵重文件。

(二) 提高钱业素养,造就新型人才

面对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秦润卿认识到钱业界必须提高自身素养,培养新型人才,以应对各种不同的挑战。为此,作为钱业领袖人物的秦润卿积极倡导,紧密部署,作了诸多努力。

首先,在秦润卿的大力倡导下,钱业公会在1921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钱业月报》。该刊由屠光甫任主编,1926年屠氏离职后,另组月报委员会主持其事。秦氏对《钱业月报》的创办一直予以关注,并寄予很大希望,力图通过此刊向钱业同仁灌输新观念、新知识。为此他在创刊号上撰写了一篇充满时代气息的《发刊缘起》,提出上海钱庄业必须通过加强资本、改良营业、分散放款、培养人才、调查统计五项革新措施,破除钱庄陈规陋习,改革传统经营习惯,改封闭型企业为开放型或半开放型企业。他还要求以此“联络同业之感情,维护公共之利益,促进其业务上之发达,矫正其习惯上之弊端”。^[4]此后,对于刊物人事安排、栏目设置、内容登载等,他都亲自过问。秦润卿还经常在《钱业月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许多有价值的主张和建议。《钱业月报》创刊后,一方面对于重大经济金融事件、政府当局重大经济决策及时作出反应,将钱业界主张公之于众,另一方面对于钱业营业方针和手续也时有评议。此外还刊载金融知识及钱业调查报告,特别强调钱业改革的重要性,并提出革新的方法。该刊还一反过去各庄股东资力一向对外保密的旧规,首先公布了各庄股东经副理姓名、资本金额等,并于1922年起每年刊行同业录(仅1925年停刊一年),1924年第4卷4月号起连续刊载银洋进出、公单划解统计表。

《钱业月报》的创办对于宣传钱业公会主张,扩大钱业公会影响,增加钱业界人士的近现代金融知识,推动钱业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份民国时期办得比较成功的经济刊物。1938年因抗战停刊,1947年复刊,1949年4月出至20卷4号后停刊。

其次,大力培养钱业子弟。1923年,秦润卿不满于“沪上学风之失坠,尤病教会学校之曲

徇西俗，课程偏失，其施教不合国用，驯至汨没国性”，于是利用钱业会馆余屋办起“修能学社”，专收同业子弟。“自定规制，增益中国文史之教材，兼设外语、数学、商事等科，且时时示以为人处世之理”。^①为办好学社，秦润卿先后聘请同乡学者冯君木、陈布雷为社长，教师一职也多由名流学者担任。后因钱业中学设立，该学社停办。

1924年冬，钱业公会创设上海钱业公学，以培植同业子弟为宗旨。为办好学校，钱业公会设立9人组成的校董会，秦润卿担任董事长。因“修能”规模有限，对于这所学校的发展，秦氏十分关注。据时人回忆，秦润卿对于学校“一切兴革设施均亲自过问，不同于一般挂名的董事长”。^②在秦氏的关心支持下，学校稳步发展。1925年2月该校正式开学。开始时仅设小学部，1926年增设初中部，招收初中一年级生。1929年秋，更名为上海市私立钱业中小学。到1937年7月，学生增至300余人。1947年“全校计有初中三级分七组、小学及幼稚园七级，分十八组，学生总数达1500余人”。^③（653-654）

二

秦润卿在主持钱业公会期间，还积极推动钱庄业的团结与合作，为谋求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诸多努力，特别是统一钱业市场与现金公库以及联合准备库和钱业业务研究会的建立，为钱业应对金融风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统一钱业市场

为评定银拆洋厘，上海钱业很早就有钱业市场（俗称钱行）之设。原分为南北两个市场，南市设在豆市街济阳里，北市设在天津路阜成里，后迁至宁波路兴仁里。“因北市市面较大，各业大都以北市场的洋厘为准则”。^④（652）1922年上海钱业公会新会所建成。次年，在秦润卿主持下，南北两市合而为一，迁至新会所一楼，由钱业公会组织“市场委员会”进行管理。每日各钱庄均派“钱行”到场会议行市，凡头寸的拆进拆出，现洋的买进卖出以及划头的划进划出，都在市场成交。这个市场虽为钱业市场，但银行、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均可派员到场交洽，委托钱庄代为在场交易。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长时期

内，事实上钱业市场的交易也就是上海金融界的全部交易。由于钱业公会掌握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行市，因而在市场上有极大的发言权。^⑤

（二）建立现金公库与联合准备库

钱庄汇划制度是信用制度的一种，以汇划票据代替现银交易，是为了省却现银收解之繁杂。19世纪下半期，应当时需要而产生了一项简陋的公单清算制度。此制度开始实行于上海北市同行间。当时各钱庄划帐的人时常挟着“总划簿”在路上寻划或在弄堂口等候，以便寻到或等到别家“划银子”的进行轧划，所以，如果没遇到某家划账的人，则无法和该家相划。到了实行公单以后，大家需要一个集中轧公单的地方，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左右，上海钱业同业组织乃于钱业市场中附设一“汇划总会”，作为公单集中交换清算的场所。1924年，上海发生钱庄栈司润生被劫之事，加之找零数变现实有不便，所以，钱业公会在秦润卿的支持下，决定自1925年起，每会员庄交纳现银1万两存于公会作为表现基金，以资担保。当时共87家，计银87万两，建造公库储藏。如此以后各庄有应解他庄的余额时，不必解送现款，可借此项基金而在总会用滚存办法滚存至次日再计。^⑥（494）后来此项基金又相继增加至每家2万两、3万两。

为避免大量资金闲置，1928年5月，钱业公会通过决议，各庄可以利用表现基金出借。“公决倘遇必要时，拟将同业公存之表现基金出借，以维市面……每庄得借银1万两，息照市折减一钱”。^⑦（531）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工商疲滞，金融风潮频仍，小规模的钱业联合已经无法应付金融危机。秦润卿意识到必须组织大规模资金准备机构。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一度发生金融恐慌。“金融界有糜烂之虑”。为防患于未然，秦润卿建议组织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将各庄财产由公会保管，“就各庄之能力集合，每家至少20万，多多益善。结果，成绩甚佳，截至（3月）5日止，已有70家划进共计银额有2583万两。决定现款集中，维护全沪金融，故此次虽有重大危险，而金融（指钱庄）已履险如夷云”。^⑧（532）同时，上海银行业也仿效钱

①参见陈训慈：《秦润卿先生史料集序》。

庄,成立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5月1日,战事平息后,银钱两个委员会取消。但它们的成立有效地阻止了现银外流,对稳定上海金融起到积极作用。钱业同人更从中看到了钱业联合起来的力量,从而为钱业联合准备库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1932年7月18日,钱业同业公会临时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将钱业特别财产保管委员会改组为钱业联合准备库,并请秦润卿胞弟秦褰卿拟订章程,加紧筹备工作。秦褰卿为钱业公会秘书长,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任汉口中孚银行经理10余年,对金融业务颇有造诣。秦润卿对他相当器重,并要他一手负责联合准备库的筹备工作。8月2日,钱业同业公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举行。会议通过《钱业联合准备库章程》,并决定联合准备库执行委员由钱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兼任,经理则由秦褰卿担任。10月1日,位于宁波路上的钱业联合准备库低调开业。

联合准备库成立后,上海各汇划庄全体加入为基本会员。规定各会员必须缴纳20万元的财产,由公会保管。^①联合准备库的主要作用在于代理同业收解及办理同业拆放。每日由准备库代各庄集中转帐,当日公单决算后,加入各庄拆放款项,以轧平不足。这不仅简化了汇划的手续,而且有效地调剂各庄的资金,对上海钱庄裨益甚大。钱业准备库成立以后,上海钱庄拥有了正式的集中准备金,其应付金融恐慌能力随之加强。

钱业准备库深受同业欢迎,成立后营业日见发达。1933年1月22日《申报》报道说:联合准备库“自去年十月一日开幕后,事业日益发达,会员钱庄对于外滩银行(指外商银行)收解,完全委托准备库办理,由准备库公领各会员钱庄中央银行钞票总额已达三千万元,办事人员增至三十二名,办公时间每日延长至下午九时为止。现金准备自三百万元增至三千万元,连财产准备(五千万),共在八千万以上”。^[7]

(三)革新钱业业务

作为钱业行家,秦润卿深刻意识到钱庄由于其先天局限而潜伏的风险,为此他十分重视钱业业务革新问题。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工商业凋敝,金融业经营环境趋于恶化,秦

润卿力主改进钱庄业务,不仅组织相关机构研究改善业务方法,而且利用钱业公会相关会议,反复告诫同业,防患于未然,推广有关革新方法。

1930年7月2日,针对当时不仅倒闭钱庄大量增加,而且“考厥原由,虽有多端,而以受股东牵累为其主因”,秦润卿在钱业公会第十三期常会上提出议案五项,以藉供采择:1.股东在本庄往来,应有存无欠,即其联号往来,如有欠款,其总额亦不得超过该东所占股份。各业运用全赖股本,吾业既为无限组织,则股东在其所认股本以外,尤须负相当之责任,是股东不能任意欠银,至可明了。至于联号,虽因同一股东关系,与各庄往来,然其限额亦不能超过该东所占股份。万一有不幸事件发生,则旁人亦易于援手,不致有牵动全局之虞。2.各庄如不幸而遇倒账、呆账时,除盈余公积外,其总额如超过股本半数以上,须即添加资本。倒账、呆账为同业不可免之事,其受损如果不大,则盈亏相抵,适得其平,不致使资本呆滞,失其运用力。若其总额超过在其股本半数以上时,则其所损之数,即无异使股本缩小,易致摇动,是以各庄倘发生以上事项时,各经理人断不能隐讳。必须将其原因详告股东,请其加足股本,以固基础。3.经协理应以身作则,绝对禁止投机。经协理负股东重托之重任,当如何专心一致,力图发展,如其兼营投机事业,则用心分歧,终至僨事,且投机因眼光不同,常有意外损失,或因此而有不规则行为,损及各庄资金,尤须切戒。至各伙友,承继协理之意旨,如在上者兼营投机,必至上行下效,弊窦滋生,防渐杜微当以经协理为则。4.存放款项须通盘计划,万勿迁就滥放。各庄放款须视资本总额及存款数目,并估计实力,通盘计划,方可定放款之标准,其巨额信用放款,更须慎重考虑,万不可专注重一门,庶几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不致失其运用之能力。5.年终决算须登钱庄月报,俾众周知,以为改革之第一步。迨后尤须请人查账,与银行界互相提携,共策进行,庶不至貽落伍之讥。以上提案,“提付公决结果,一至四各款通过无异,惟第五款,暂为保留”。^[8]

1933年,由秦润卿发起,钱业公会创设钱业业务研究会,由理事15人组成理事会,凡钱

^①参见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76年,第101页。

业公会会员均成为会员。该会以“提倡改革与钱庄业务之扩展”为宗旨，^[9]积极探索钱庄业务改革，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加强与新式银行的竞争力。俞佐廷、傅松年、王怀廉等具有革新思想的钱业领袖都是研究社的骨干分子。他们关于钱业改革的经验与主张，经有关报刊宣传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许多钱庄所采纳或仿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上海钱庄业的革新步伐。

1935年起，钱业公会成立改善业务委员会，决定每年分春夏秋冬四季，举行各庄经理会议，“集议”业务改进办法。^[10]

期间，秦润卿领导的钱业公会还努力向外开拓，协调与有关方面的关系，从而为钱业的发展赢得了空间。如上海银行公会是上海重要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加之宁波同乡盛竹书长期担任银行公会会长，后秦润卿也担任上海银行公会候补执行委员，两者关系非同一般。秦润卿十分重视与银行公会的关系，努力加强双方在金融业重大问题上的协调与联络。早在1920年11月，针对地方当局有关“庄票支票庄摺均须贴用印花”的规定，两会“公同集议”，一起向当局提出贴用印花税的几个先决问题。^[11]进入南京政府时代，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趋于密切。为保障同业利益，对外协调行动，在处理重大或紧急事务时，两会设有银钱业联席会议机制。联席会议通常在银行公会举行，钱业方面多由秦润卿出席。召开会议时，由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共同担任会议主席。两业代表就需要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议决办法，最后由两会分别通知各自会员行庄知照。联席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特殊形势下金融业的互助与合作以及社会赈灾与救济、金融业务等问题。

在1923年11月，沪埠银根奇紧，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协商，采取了协调行动。1924年10月，银钱两公会再度携手，致电北京财政整理会及总税务司，要求维护内债信用。进入1927年以后，上海银钱两业是国民政府内债的主要承销对象，两业有着共同的利益。从1927年5月银钱两业商洽如何承销政府内债起，到1931年联合反对政府停付内债本息风潮，再到1932年与政府相互妥协，使公债整理得以出台，上海银钱两公会均采取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来商定办法，

协同行动，并以两公会的名义对外联络一致，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积极的努力。1931年长江大水灾后，上海银钱两业为救灾募捐起见，曾组织“银钱业各地水灾临时集捐会”，协商募集捐款及如何分配款项。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两业为停市及停市期间如何维持金融，开市及如何预备开市等问题多次举行联席会议以求协调行动。显然，银钱业联席会议的举行，有助于两业及时沟通意见，协同对外方针和步伐，在维护金融业利益、协助政府相关政策的实行以及进行社会救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

（四）增强钱业资力，扩充业务范围

资本雄厚不仅是金融企业实力的象征，而且能增强其业务运作能力，抵御金融风险。长期以来，钱庄资本都相当有限，与新式银行相差甚远。故增强钱庄资力，扩大业务范围，成为钱庄近代化重要途径。对此，1909年秦润卿担任豫源钱庄经理后即着重于此。1920年担任钱业公会会长后，秦润卿领导上海钱业界在这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当时钱业公会极力推动钱庄业增资合并，使各钱庄资本迅速得到增加。在钱业公会成立的1917年，上海49家钱庄中，资本在10万两以上钱庄仅占3家。到1926年时，上海钱庄共87家，资本10万两以上者共80家，其余7家资本也在4万两以上。在80家10万两以上资本的钱庄中，又有37家在20万两以上。1935年时，上海钱庄共55家，资本在50万元以上者已有12家，而55家钱庄平均资本额则高达35万余元，为清末民初钱庄平均资本额的10倍。其中最大钱庄资本额达80万元，凌驾于不少地方银行之上，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工商业放款。

在增强钱庄资力的同时，在钱业公会的倡导与推动下，20世纪20年代后，上海钱庄积极扩大业务范围，增加业务品种，在钱庄银行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如有些钱庄仿效银行添设储蓄存款、抵押放款、工厂放款、信托、汇兑等部。除存放款主要业务外，钱庄还模仿新式银行开展连带业务，如保管贵重物品、代客买卖有价证券等。据统计，到1936年，在上海钱庄中仿效银行办法的钱庄，已占总数的2/3以上。^[12]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上海钱业公会是由传统

的公所会馆演变而来。长期以来,受传统习惯影响,钱业同业组织领导权都垄断在个人手中。秦润卿主持钱业公会后,身体力行,力图改变大权独揽的局面,扩大会员特别是全体会董参与公会事务的权力,并使之制度化。如1923年1月修正的上海钱业公会章程规定,钱业公会每月举行常会两次,总董认为必要时随时召集之;公会会议须会员2/3到会,得到会会员2/3以上同意,方可决议。还规定:公会设总董1人,总揽会务,对外为全体代表,公会函牍均由总董盖章签名;设副董1人,辅助总董,襄理会务,如总董请假或不能执行会务时,由副董代之;选董事10人,总董、副董由董事互选。^{[2] (661-662)} 1928年1月初,钱业公会在秦润卿主持下,改为委员制并议定暂行章程十条。其中规定:1.本公会设执行委员十五人,皆名誉职。2.执行委员由会员中选举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之责,对外无单独代表本公会全体之权。3.委员选举用单记名投票法,任期二年,连举得连任。4.委员会为便于执行会务,按月轮推常务委员二人,主持一切,凡公会函牍均由常务委员签名盖章。5.会务分重要、次要、寻常三种,寻常会务由常务委员随时处理,次要者召集委员会会议执行,重要者由常务委员提出会员常会或特会公决之,会员特会由委员会提出或全体委员十分之一以上之请求均得召集。6.会议时主席以常务委员中一人充任之。^[13]这些制度建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钱业公会发展成为现代同业组织,从而为其良性运行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有效地增强了钱业的凝聚力。综上所述,秦润卿带领钱业,顺应时代要求,

借鉴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方式,革除钱业弊端,走银行化的道路。在秦润卿的积极领导下,上海钱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大大增强,钱业公会在钱庄业中的地位大为提高,其功能也大大扩张,日益成为钱业应变措施的组织领导者,从而在上海钱庄中享有极大的权威,甚至有学者喻之为“上海钱庄业的灵魂,在上海有很大的势力”。^[14]显然钱业公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钱业的发展与进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影响已超出上海,实际上成为全国钱业界的风向标。无疑秦润卿这个立足传统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本土企业家的作为至今仍值得人们回味。

参考文献

- [1] 佚名. 钱业公会欢宴全国商会代表[N]. 申报, 1921-10-21.
-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12.
- [3] 佚名. 上海钱业界之新猷[N]. 申报, 1921-02-13.
- [4] 秦润卿. 发刊缘起[J]. 钱业月报, 1921, 1(1).
- [5] 周采泉. 我所知道的秦润卿[C]//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编. 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 [6] 洪霞管, 张继凤.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29.
- [7] 佚名. 钱庄联合准备库总额增至八千万元[N]. 申报, 1933-01-22.
- [8] 佚名. 昨日钱业公会常会[N]. 申报, 1930-07-03.
- [9] 郭孝先. 上海的钱庄[J]. 上海通志馆馆刊, 1933, (1): 846.
- [10] 佚名. 钱业改正业务[N]. 申报, 1936-03-12.
- [11] 佚名. 银钱业贴用印花税问题[N]. 申报, 1920-11-22.
- [12] 佚名. 新年钱庄业之统计[J]. 中行月刊, 6(5): 39.
- [13] 佚名. 钱业公会议定暂行简章[N]. 申报, 1928-01-09.
- [14] 杜恂诚. 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8.

Qin Runqin and Native Banks of Modern Shanghai

SUN Shan-g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Qin Runqing, a great banker in modern China,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Gang of Ningbo. He led the native bank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drew lessons from the management of banking, and got rid of the malpractice. What he did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money industry in Shanghai in the twenties and the thirties of last century. His innovative practices which based on the tradition and advanced with the times are worth our pondering.

Key Words: Qin Runqing; native banks; native bank association

(责任编辑 王 抒)